

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文化的周期性演变

崔世广

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矛盾双方力量的彼此消长，这种对立和冲突也或趋于激化或趋于缓和。其结果，使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的样态。下面，本文试对这样的周期性变化过程进行简略勾勒，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内在矛盾进行粗浅的分析。

—

日本现代化的基础是传统文化，这本身已经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仅没有被彻底否定而消亡，而且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但是，上面的事实并不说明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并保存于现代社会。

对后进的东方国家日本来说，其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开始的，因此，保持和利用传统文化来抵御列强——攘夷，是日本现代化的原点。但是，在西方文明支配近代以来世界的大势面前，为了实现攘夷的目的必须富国强兵，而这除了学习、移植西方文明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不管日本乐意不乐意，经由学习西方文明进行现代化是其必由之路。这样，必然对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引起日本文化的不断变化。而且，西方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其物质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一旦西方的物质文明被移植到日本，这种内在的联系就会自发地发生作用，使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原理和价值观念也涌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基础部位产生深刻的作用。另外，现代西方文明虽然诞生于西方，但其中也包含着人类普遍性的因素，包含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也是西方文化得以源源不断涌入日本，越来越深入日本文化的基础部位，使日本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西方文明支配近代以来世界的现实，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人类普遍性因素，以及在此基础成立的近代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合力在支持和加强着西方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的强度和力度，使日本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是，日本文化又是有着自身特性、自成体系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结构上的差异。而且，不仅在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日本人瞧不起西方的“蛮夷”文化，就是近代以来向西方的学习，也并不是那么情愿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攘夷”，即为了抵御来自西方的压力。因此，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是日本近代以来始终一贯的夙愿和课题。这样，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日本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几次大的冲击和挑战，但每一次冲击和挑战又都毫无例外地会受到日本文化的抵抗和反击。其结果，呈现了欧化主义风潮和复活传统运动的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这样的文化波浪性周期运动既蔚为壮观，又耐人寻味。下面，仅对其进行简要的勾勒和描述。

第一个周期：明治维新（1968年）——明治末年（1911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将“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基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开始积极推行“文明开化”、移植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政策。在明治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纷纷被介绍到日本，在明治初年形成了一股文明开化的欧化主义风潮。1883年建成的“鹿鸣馆”，成为这一时期欧化主义风潮的象征。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以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和功利主义伦理观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继承启蒙思想而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既是一场主张伸张个人独立自由权利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批判传统价值观念，改革传统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植木枝

盛就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及其道德进行了激烈批判，积极提倡建设新的近代家族道德。在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对日本传统社会习惯和思想观念形成了一次有力的冲击。

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也带有浓厚的欧化主义色彩，存在忽视民族传统文化等深刻问题，由此引出了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的反动。早在明治十年代，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和儒教主义者西村茂树就开始批判文明开化风潮的流弊，认为其“置忠孝于脑后”，“流于轻薄浮华”，极力主张复活儒家道德。同时，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也纷纷转向，开始批判曾大力宣扬的天赋人权论，鼓吹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福泽谕吉将缓和政治对立、收揽人心的根据求之于“数千年来君臣情谊”、皇室“为万民的宗家”，即日本人的人情世界，并批判自由民权论，为实现“官民调和”而鼓吹“内安外竞”。加藤弘之则将论说忠孝一致的儒家家族主义与有机体论结合在一起，攻击天赋人权论，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传统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明治初年出现的欧化主义风潮的反动。

第二个周期：大正初年（1912年）——战败投降（1945年）。日本于明治时代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进入大正时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不仅减轻了对日本的压力，还使日本资本主义获得了异乎寻常发展的天赐良机。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带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成长的同时，也使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突出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又出现了学习、模仿欧美推进现代化的“新时代”运动，又形成了一次欧化主义潮流。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形成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而以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为代表的大正民主主义影响最大。大正时代新思潮的特点是用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来推进日本的政治、社会现代化，因而具有开放性、世界性和大众性。其虽然是在明治时代形成的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体制的框架之内展开的，但仍从社会、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对日本的传统形成一次较有力的冲击。

但是，进入昭和时代后，世界和日本的局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上，围绕中国问题等，列强加大了对日本的压力，使日本处境困难。在国内，由于遭受经济危机打击，农民贫困，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激化。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日本开始逐步走上对外侵略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大正时代的欧化主义思潮的反动。随着内外环境的恶化和法西斯体制的确立，一切与西方文化相联系的事物和思想，包括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都遭到迫害和镇压，皇国思想、国体观念等传统的东西被强调和夸张到极端的地步，大肆泛滥。在国外对西洋的战争升级的同时，在国内，西方文化也为日本传统文化所吞噬。虽然日本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庞杂，但有一个共同的和明显的特征，这就是日本主义论。其主要内容则是日本国体优越论、天皇中心主义论和日本精神论，成为日本法西斯进行对内改造和对外侵略的心理支柱和理论依据。

第三个周期：战后初期（1945年）——昭和末年（1988年）。战后，在美军占领之下，日本实行了民主化改革。美国从根本上改造日本以不使其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意图，和日本人对现代化失败的反省相结合，使改革进行的较为彻底。其结果，战前的法西斯体制及其思想遭到否定，日本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被塑造成了现代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形成了一股以欧美为标准的民主主义思潮。传统的社会原理和价值观念受到彻底的批判，西方的民主主义原理和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丸山真男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前现代性”的批判、大塚久雄对日本“非合理主义”的批判、川岛武宜对日本家族制度的批判等，在当时都很有代表性，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都举起了民主化的旗帜，批判日本的后进性。使日本传统文化受到了最严重的一次冲击和挑战。

但是，随着美国结束对日占领，日本出现了针对占领政策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主要是针对战后改革而出现的，表现为主张修改宪法，提高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民族主义诉求。尽管战

后国际关系的特点和日本采取的追随美国的政策，决定了这股民族主义潮流不可能采取反美、否定欧美文化的显在、激烈的形式，但其实质无疑是与欧美文化相排斥的。特别是当 60 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又出现了反省战后文化政策，强调日本文化独特性的风潮。70 年代以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广为流行，成为了大众“消费品”，其基调在于赞美日本式经营，肯定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文化优秀论。世界上出现的“日本名列第一”、“向日本学习”等论调，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日本迎来了讴歌日本文化、肯定日本文化的黄金时代。

第四个周期：平成初年（1989 年）——？。冷战的结束，本来给日本提供了凭借经济实力参与国际事务的绝好机会，但无奈此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不仅失去了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本，还给日本人的自信心以沉重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在 90 年代以后的日本，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主张“第三次开国”的改革风潮。其主要表现在：打破“护送船队”方式，放宽限制，对行政、金融、教育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批判日本式经营方式，打破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导入能力主义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批判日本式集团主义和平等主义，导入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观念；批判学历主义和无特色、划一性教育，倡导教育的个性化、多样化、自由化和国际化，重视培养学生的个性、能力和创造性。这一改革思潮矛头直指日本文化的核心——集团主义，实质是以美国式的市场原理和个人主义竞争原理来改造日本。这次的美（国）化主义的风潮，又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人自信心的逐渐回复，已经开始出现向传统复归的动向。现在，这个周期还没有结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动向会越来越强。

二

由以上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变迁呈现了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大体以 45 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其中只有第二个周期比较短一些；每个周期的前期为吸收西方文化的时期，而后期则为向传统复归的时期。

虽然因国内外环境和日本所面临的课题不同，各个周期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也存在着共同的逻辑。尽管每次移植西方文化的欧化主义运动各有着其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在思想上的共同之处，是强调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和人类意义，以此主张学习和移植西方文化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并由此否定传统文化。例如，文明开化期的人们所依据的是“野蛮——半开化——开化”的历史进化论；大正时代学习欧洲文明的思想基础是世界和人类；战后初期以西方的民主主义原理否定日本社会原理的依据也是近代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90 年代以后则是依据全球化潮流下的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原理的普遍性。与此相反，每一次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和反击的共同依据，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例如，明治 10 年代以后传统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是日本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法西斯主义用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依据，也是日本国体独特论和优秀论；同样，否定战后民主主义原理和民主改革成果的思想，也根源于日本文化特殊论。

之所以会出现上面的情况，是由日本现代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日本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是在西方文明支配并传播于世界的前提下，以学习西方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对日本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具有普遍性意义。而且，对于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的日本而言，在特定的时期内以普遍性为依据来迫使传统文化让出一些阵地，为移植西方现代文明开辟道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又是产生于不同历史背景之上的，有着不同的社会原理和文化观念。对西方文化的全盘移植，必然会破坏传统文化生存的基础，使日本失去民族个性，这又是与日本现代化的目的相悖的。因此，不断

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为武器，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延续，就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经常性课题。

尽管西方文化占据着“普遍性”的有利地位，但在日本这块土壤上与日本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却难以迅速获得太多的成果。因为日本传统文化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现代化的初衷也是为了保存和维护传统文化。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日本传统文化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多次冲击，仍能保持经久不衰，一直顽强地生存于现代社会。这也决定了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移植，基本上或在大多数时期内是抱着有助于加强自身的功利性目的进行的。而且，对西方文化的移植，也尽量将其限定于技术等外在的物质层次，而对深层次的文化移植，则在主观上抱着深深的拒斥心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冲突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冲突的结果是成立了以《帝国宪法》、《明治民法》和《教育敕语》为标志的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体制。在这里，虽然在宪法和民法的财产篇中引入了西方的议会制和天赋人权论，但却由于保留主权在君的天皇制、封建家族制度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使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形式化了。而且也不能否认，对西方的政治、法律形式的移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有利于对西方的交涉这一现实目的。第二次冲突的结果更惨，西方文化受到彻底批判和沉重打击，几乎被根除。第三次冲突虽然看似有利于西方文化的移植和吸收，但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官厅等工作场所又成为模拟共同体，传统共同体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思维模式又得以重建，以致形成了日本式的企业文化、政治文化等。第四次冲突的结果虽然还没有看到，但可以预料，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景气，日本人重新找回民族自信，也必然会出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现象。

可以说，无论今天还是今后，支配日本人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主流，仍是传统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反复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日本文化，无论其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而且，随着冲突的深入展开，西方文化融入日本文化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更强。影响也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和广泛。日本文化一方面应付着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一方面不得不按照时代的要求而改变着自身。也就是说，尽管日本人一直是以“和魂洋才”的态度和思维模式来接受和移植西方文化的，但随着时代的进展，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日益深入，“洋才”的涵义、领域和范围在不断扩大，由技术逐渐扩大到制度，再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在不断侵蚀“和魂”的固有领地。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

这样，虽然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被保存和延续下来，现在支配日本的社会关系和思维方式的仍是传统性质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也模仿西方的方式建立了资本主义体制，具有了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我们知道，形式是不能没有内容的或一直与内容完全相脱节的，一旦具有了某种形式，就会要求充实相应的内容，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痛苦的和充满矛盾冲突的。在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西方文化必然会利用各种方式和借助各种现成的形式向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渗透，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迫使日本传统文化做出一些改变，让出一些地盘。人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西方文化已经在日本具有了越来越深入和广泛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西方式政治制度形式的确立，也体现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价值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开始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场合影响和支配着部分国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另外，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加深，也使得传统的共同体主义的主从关系模式和心情主义的感情系列的相关各要素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在幕末维新时期，出于应付列强威胁，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传统主从关系结构中平等、对等的一面得到强调，许多志士仁人纷纷脱离自己原来所属的共同体（“脱藩”），作为“浪人”、“草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四处奔走，出力献策。这些人横向联系的纽带也不是情，而是脱离了具体人际关系

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志”。明治维新后，随着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开展，西方独立自由思想的输入，“立身出世”意识的高涨，更加强了上面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在明治初期曾带来传统的家共同体的解体。但是，一到《帝国宪法》、《明治民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以传统家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心情主义的文化心理借助体制的力量站稳了脚跟。从此，主从关系和“温情主义”开始向军队、企业渗透，逐渐在这些场合建立起来。但是，在家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天皇制国家体制确立后，随着家族主义国家观、忠孝观念和天皇意识的灌输，主从关系结构的重心开始偏向上对下的支配与下对上的服从方面，就是在大正时代，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倾向。到法西斯体制确立后，这一上下支配服从关系更被强调到极端，成为法西斯专制主义，作为其补充的则是神道的神秘主义、非合理主义。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摘除了法西斯主义的毒瘤。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的普及，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强调平等、对等的意识作为法西斯主义被否定的产物曾一度占了上风。但是，在企业、官厅被当作新的模拟共同体被创造出来后，相对平衡的主从关系和人情关系又被确立起来。尽管由于现代化的进展和美国文化的强烈影响，现代的主从关系和人情关系已不同于战前和前近代，已有了较多的主张对等、平等的因素。但既然仍是主从关系，就仍受传统共同体主义和心情主义文化的制约，有着固有的特征和缺陷，如人际关系的闭锁性和思维方式的非合理主义，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与日本现代化的特性相联系，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移植或排斥，总是与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日本对西方文化的移植或排斥，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与当时日本所面临的课题及解决这样的课题的方式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讲，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吸收与排斥、批判的周期性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对西方国家的崇拜与排斥这样的循环往复过程。这样，不仅往往使移植、学习西方文化带有一定的狂热性、一带而过性，而且由于总是以西方文化为坐标，丧失了东方文化的视点，从而使其近代以来文化的发展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总之，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己的现实需要，曾几次大规模接受和移植西方文化，这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变异。但是，不管以什么方式、什么途径移植西方文化，最终都没能破坏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并经过了几次重大挑战和考验而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今天的日本文化，虽然呈现出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这两种要素的并存和融合，但相对于日本传统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在现代日本文化结构中仍不过是形式的、表层的东西。这一方面保证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对现代化的主体性，但同时也遗留下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久远课题。

（载《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